

ZHONG WAI LI SHI
ZHUAN TI YAN JIU

中外 历史专题研究

丁柏传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96949

K107
8

中外历史专题研究

丁柏传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历史专题研究/丁柏传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8

ISBN 7-5035-1427-2

I. 中… II. 丁… III. 史学-专题研究 IV. 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0852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66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4.50 元

卷 首 语

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篇》）意思是素质高的人应具备渊博的知识，应博古通今。只知古而不知今，泥古不化，那就毫无用处；只知今而不知古，不通晓历史并借鉴历史经验，那就如瞎子一样（至少是高度近视），无法洞察世事。这个道理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完全适用。

我们的各级干部要胜任“四化”事业的领导工作，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其中中外历史知识应是重要的一项。今天的历史是昨天历史的继续，今天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有昨天的历史渊源，因此要透彻地认识今天，办好今天的事情，就必须了解昨天和前天。特别是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不了解中国历史，如何能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整个世界已经联成一个整体，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此作为一名现代领导干部不仅要了解中国，而且要了解世界，懂得世界昨天和前天的历史。

共产主义者是一贯重视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是在透彻研究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基础上作出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懂历史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七十五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向全党发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의号召，其中特别强调了学习历史、

掌握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我们中华民族是个最重视历史、重视传统的民族，几千年来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历史著作，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不学习历史，历史知识甚少，那是很大的缺陷和遗憾。学习历史，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启发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使我们的思想更丰富，头脑更聪明，有助于把工作做得更对路，更有成效。这个道理，我们的许多干部都已想到或者切身感受到了。

为适应各级干部学习历史的需要，丁柏传同志主持编写了这本《中外历史专题研究》，奉献给广大干部，以期提供一些重要的中外历史知识，并引发大家学习历史的欲望和兴趣。如果这个尝试取得好的效果，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同类书籍问世。

刘耕路

1996年7月10日

前 言

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里，历史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知古鉴今”，“以史为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些至理名言都是历代政治家政治活动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他们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②。无产阶级的导师们对历史学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和重视，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有远见、有作为的政治家，之所以能够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清醒的政治预见，从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渊博、精深的历史知识是助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见，历史知识是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和史学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有所了解，对于我们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来说，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国家的兴衰，政权的更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将这种沧海桑田式的政治剧变“都付笑谈中”中的，只能是浪漫的诗人，而政治家却是不能如此超然、轻松地对待的。一个国家或政权为什么兴盛，又因何而衰亡？其间的规律是什么？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或教训？对此，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会认真地思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

②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和探究，期冀能够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实践有所资助和鉴戒。所以，考察一番中国古代某些朝代兴衰的历史，通过典型实例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想必会引起我们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的兴趣，能给他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启迪。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就是说，宗教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宗教的客观存在，又反过来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任何政治家都不能无视宗教的这种存在和影响。对于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处理宗教问题，将关系到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和民族的团结等诸多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宗教政策是否得当，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在我国，广泛流传的主要是土生土长的道教和自外部传入并中国化了的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等。因此，介绍一下关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基本知识和情况，使得我们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增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加深对我们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的自觉性，将不是没有益处的。

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放眼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只有加倍努力，迎头赶上，才能昂首挺胸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意气风发地从事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信心百倍地阔步迈向21世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顾一下某些国家和地区所走过的现代化的历程，对于我们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来说，可以开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阔思路，增长见识，汲取借鉴，消化吸收，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

本书编撰的缘由和主要内容，即在于此。

本书的框架结构是由丁柏传策划设计的；但各个专题的研究文字则是由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教研室的同志们分头撰写的。撰写分工如下：

丁柏传：孔子《春秋》的历史政治观，司马迁的史学活动与西汉政治，从《资治通鉴》看中国传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唐朝由盛转衰的一面镜子，宋朝“积贫积弱”原因探析，道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伊斯兰教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日本二战后经济腾飞的历史考察；

王子今：毛泽东与历史学，秦朝与西汉政治风格的历史比较，中国民间礼俗迷信概论；

岑大利：明朝兴衰的历史考察，基督教在中国；

史远芹：近代中国的史学与政治；

曹贵民：晚清衰败的原因与教训；

何承琅：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启示；

牛伟宏：英美法德近代化历程比较探析；

廖小鸿：佛教与中国社会。

近几年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中，历史教研室的同志们开设了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受到广大学员们的热情欢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已经开设的专题讲座加以选择、调整、修改和补充，最后由丁柏传统稿审定而成的。所以应该说，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本书在编撰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刘耕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叶佐英编审、王杰副编审，中国燕兴总公司王东庆总经理以及李俊玲女士的强有力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又承蒙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叶振华副教授惠赐墨宝，题

签书名，更使本书倍添光彩。谨向他们表示深挚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各篇研究文字在编撰过程中，都参考、引用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出，特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深知，本书专题及篇目的选定并不全面，是否得当尚可讨论；同时，限于我们的学识水平，加之全书篇幅的限制，谬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丁柏传

1995年8月1日

于北京西郊求索庐

目 录

卷首语	(1)
前 言	(1)
 一、史学与政治	(1)
毛泽东与历史学	(3)
孔子《春秋》的历史政治观	(15)
司马迁的史学活动与西汉政治	(27)
从《资治通鉴》看中国传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45)
中国近代的史学与政治	(60)
 二、历代兴衰的启示	(81)
秦朝与西汉政治风格的历史比较	(83)
唐朝由盛转衰的一面镜子	(99)
宋朝“积贫积弱”原因探析	(124)
明朝兴衰的历史考察	(141)
晚清衰败的原因与教训	(152)
 三、宗教与中国社会	(167)
佛教与中国社会	(169)
道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187)
伊斯兰教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206)
基督教在中国	(221)

中国民间礼俗迷信概论	(235)
四、世界现代化历程回顾	(249)
英美法德近现代化历程比较探析	(251)
日本二战后经济腾飞的历史考察	(283)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启示	(303)

DQ44/18

一、史学与政治

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就扮演着记录者、解释者和批判者的角色。他们通过研究过去，为当下提供借鉴和启示。在政治领域，历史往往被用作一种工具，来塑造国家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或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然而，历史本身是客观的，它不会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改变。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和公正，不受任何权力的干扰。



毛泽东与历史学

不论古今中外，一般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往往都比较重视历史学。这是因为历史经验的借鉴，有助于他们的政治实践，从而进行政治预见能够比较准确，把握政治方向能够比较稳重，从事政治管理能够比较成功。

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就是说，历史知识可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吸取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历代从政的人们久已形成的一种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等，其中的所谓“鉴”，都是这个意思。历史，被有识见的政治活动家看作现实的镜子。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十分重视历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也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总结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时，也说道：“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

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

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十分关心历史学、充分重视历史学，善于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斗争实践的革命家。他的政治事业的成功，和他深厚的历史学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政治实践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有远见的政治活动家必然应当具备历史洞察力，这样才能有清醒的政治预见，才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 ‘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经历了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大体说来，毛泽东当时常常代表着正确的意见，这种意见的形成，是以符合历史的认识作为基础的。他在《实践论》一书中，曾经说明了正确和错误两种思想的分歧其实和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有关。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显然，在毛泽东看来，错误思想的认识根源，在于它们都是“离开具体历史的”。

以毛泽东的主张为代表的当时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形成，确实正是以对中国社会准确的科学的历史分析为基础的。没有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的历史判断，没有对当时中国阶级力量的准确的历史比较，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0年，毛泽东在红四军到达江西寻乌时，曾经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他在《寻乌调查》这部书中就曾经说：“这是一种历史材料”。

毛泽东的老朋友李达在1937年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书《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认真读了这部书，他在书中说到“人类认识全部历史”、“历史主义的立场”、“人类认识史”的几个地方特别画出线条作了标记，在“历史主义”四个字下面，又着重有特殊的标记。这表明，“历史主义的立场”，可能是毛泽东所肯定的认识社会的立场。

毛泽东曾经指出，“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不了解”^①。“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形成，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②。

针对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分离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曾经提出严厉的批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毛泽东提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③。他号召在全党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指出，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④

毛泽东一贯极力提倡的优良作风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话，最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原文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③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④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汉代历史学家班固称赞汉武帝的弟弟刘德的话。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包括“认真地研究历史”，“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大规模兴起之时，社会上和党内都有不同的认识。毛泽东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肯定农民运动的实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他们斗争的对象，“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①这种态度，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相比，确实表现出毛泽东站在纵观历史的高度，借助对于历史的透彻理解，把握革命运动的前景与方向的超乎寻常的远见卓识。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都是受到中国政治史千百年来的启示而总结出来的。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之后，一些出身军阵的武臣们跃跃欲试，想效法汉武帝时名将卫青、霍去病，在北伐匈奴的战争中建立功业。然而“帝方厌兵，间修文政，未之许也”。刘秀愿意以“文政”维护天下的安定，于是压抑了朝中好战的倾向。另外，早就有史学家注意到，刘秀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东汉功臣多近儒”条，其中写道：“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其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一开头就记述刘秀事迹的《后汉书》，是毛泽东喜爱的史书。他曾经比较班固的《汉书》和范曄的《后汉书》，说道：“《后汉书》写得不坏，胜于《前汉书》。”显然，毛泽东对《后汉书》以及刘秀的事迹都是非常熟悉的。1948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